

乡村产业兴旺的外生性与内生性发展路径

——基于贵州省黔县的调研与分析¹

杨力超 张冠李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摘要】:乡村振兴是我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性战略。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是产业兴旺。产业兴旺不仅以农村经济收入增长为目标,更是乡村综合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贵州省黔县①的产业发展实践为例:近年来,贵州省内相对偏远的农村社区结合本地优势,探索优先发展精细有机农业,辅以特色手工加工业、旅游服务业的综合发展路径,偏远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能够有效投入产业发展过程,从而将产业发展“楔入”乡土实际,塑造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内生性发展道路。但与此同时,中西部农村的产业发展模式不能照搬沿海地区农村的经验,以剩余劳动力外流为特征的外生性发展路径仍然是偏远地区农村家庭生计的主要来源。产业兴旺的定义和衡量标准须切合当地实际,产业兴旺的动员与受益主体是当地群众。乡村的外生性发展与内生性发展模式本质上不互斥,二者相互补充并将在远期形成具有可持续性的良好发展模式。

【关键词】:乡村振兴;产业兴旺;外生性发展;内生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23)02-0154-07

【DOI】:10.13713/j.cnki.cssci.2023.02.002

一、问题与背景

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产业?对中国乡村产业发展道路的认识和总结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一条极富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到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2018年底,全国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接近1.73亿人,占全部城镇就业总人口的39.77%。^[1]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农村家庭的主要现金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农村产业发展一直是我国的政策扶持重点,脱贫攻坚战略下提出的“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下提出的“产业兴旺”,极大地推动了农村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特别是沿江沿海地区、适宜耕作的平原地区和工业化基础较好的东部农村地区,产业规模化更是取得了质的突破。然而,产业规模化也导致了就业岗位缩减、散户竞争优势下降的问题,产业的人力资源门槛和资本准入门槛大大提升,使得许多处于劣势地位的农民进一步失去参与产业发展并从中获益的机会。西部农村地区的留守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知识和技能水平偏低,劳动力条件跟不上农村产业升级的步伐,极易被淘汰。

¹ **【基金项目】**:贵州省202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十四五’时期贵州建立健全城镇贫困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机制研究”(20GZZB15)。

【作者简介】:杨力超,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贫困与反贫困政策、环境政策的社会影响;张冠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城乡人口流动、性别与家庭、当代中国农村。根据学术伦理要求,本文中的黔县及相关地名、人名均为化名。

以上两种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发展的路径分别指向农业劳动力的“异地转移”和“就地发展”，与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提出的“外生性发展模型”及“内生性发展模型”高度关联。在当前中国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性历史时期，乡村产业兴旺深受国家政策、市场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同时与农村社区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文化基础紧密相关，存在天然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如何理解我国乡村产业兴旺的多元化样态和不同的发展路径?基于研究者对贵州省黔县产业发展的实地调研，本文尝试梳理中西部农村实现产业兴旺的外生性与内生性发展路径，例证中国乡村产业兴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农村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与乡村振兴总体战略的实施提供操作思路与理论支持。

二、乡村发展的两种模式

产业兴旺不仅是乡村产业的发展，更是乡村的综合发展和整体进步，因此产业兴旺可归于乡村发展的范畴。结合规范性研究和经验研究，本文首先简要综述乡村发展的两种取向，并以此为依据探讨乡村产业兴旺可能的发展路径。

本文对乡村发展这一概念的辨析与探讨结合了发展社会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视角。发展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发展多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依据，关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乡村发展和城乡矛盾，探讨城乡发展差距的根源与表征。经济学领域对乡村发展的研究则基于经济发展模型，计算乡村产业发展的成本、产值和利润，探索促使乡村产业实现经济指标最大化的模式与路径。在以上两种视角下，乡村发展的两种主流模式可以概括为外生性发展和内生性发展。

(一) 乡村外生性发展

发展社会学视角的分析表明，二战后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和资本不断向城市聚集，城乡二元分化日益严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地区呈现出整体性的发展颓势，经济发展水平停滞不前、环境破坏严重、传统文化分崩离析，乡村衰败成为贫困的主要特征，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着力援助农村社区发展，其整体思路是以提高经济指标为目标，由外来企业或政府主导，依靠外来的资源技术推进乡村各领域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以解决乡村发展的问题。此类发展模式统称为“外生性发展(exogenous development)”。^[2]由外部主导的发展模式起源于二战后美国和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风靡一时，其特点是追求高度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例如通过吸引外来产业进入乡村，以提升乡村就业机会和活跃本地经济；在乡村重新划分土地产权，以提升土地生产力；引进农作物新品种和先进的化肥、杀虫剂，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3]

外生性发展的经济学原理基于刘易斯于1955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理论》。^[4]其“二元经济理论”揭示了农业和工业的结构性差异，而劳动力转移是连接工农业的关键环节。随着经济发展，工业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农业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将会有效控制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推动工业发展，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与此对应，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减少，而农业生产总量保持稳定或增长，则能够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绝对生产率，农业劳动的报酬也会相应提高，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工业与农业部门劳动的比较效益最终将趋于平衡。因此，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的城乡自由流动是一种良性循环机制。

(二) 乡村内生性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发展研究和实践开始反思外生性发展的弊端：依靠外部力量谋求发展会导致乡村丧失经济和文化的独立性，并易于导致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乡村发展方式忽略了发展的多维属性。因此，近年来的乡村发展越来越强调与外生性发展模式相对应的“内生性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内生性发展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75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的未来》报告中：“如果发展意味着个人的解放和人类的全面进步，那么这种发展只能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推

动”。^[5]这种发展定义中“自力更生”的意涵发端于毛泽东思想。20世纪80年代，全球内生性发展理论不断丰富，强调乡村内部资源包括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与开发以及本地动员对乡村发展的重要性。^[3]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内外学者对乡村内生性发展的理论内涵进行了阐发，张环宙等学者将其梳理为三个方面：(1)在培养基于乡村内部生长能力的同时保护本地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是发展的最终目的；(2)乡村发展的主体、参与者和受益者是当地人，城乡之间需要破除对立，建立相互合作和协调发展的关系；(3)发挥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的作用是乡村发展的前提。

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看，内生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与舒尔茨的经济发展理念不谋而合。舒尔茨在题为《穷人的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指出，农村发展滞后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和其他发展要素(例如资本、技术、信息等)的供给不足。农村人口知识技能的提升，是现代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村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而农村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政策的支持，使得有利于农村发展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入农业部门，进而刺激“劳动力质量”的提升。^[6]

(三) 乡村产业兴旺是外生性和内生性发展的结合

比较刘易斯和舒尔茨的理论，二者都将农村劳动力认定为发展的根本力量，但是刘易斯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依靠城乡之间的外部分工实现农村人口收入增长，而舒尔茨则强调依靠农村劳动力知识技能的提升、科技进步和国家对农村本身的资本、技术投入来发展乡村产业，创造本地就业机会，实现乡村发展。舒尔茨的理论打破了城市发展工业、农村发展农业的传统二元经济结构，提出工农业发展不应该受制于城乡地理分界，城市可以开发适合本地情况的农业，乡村也可以发展工业，这就形成了城市工业与乡村工业、城市农业与乡村农业并立的四象限经济结构。与城市工业相比，乡村工业一般由当地农民自发兴起，就业者以本地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主，在乡村本地实现了劳动分工和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中国乡村发展经历了百年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沿海地区流动，是依靠城乡间的外部分工异地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本质上表现为刘易斯主张的外生性发展路径。劳动力的城乡转移极大加速了国家“低价”工业化的进程。^[7]“低价”主要是指农民工劳动力薪酬低、征收农村土地价格低、实际税收低。过去四十多年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虽然近年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收入逐渐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比自2008年起逐年下降，但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6，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处在较高位置之上，^[8]成为我国新时期实现共同富裕征途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由此可见，外生性发展只能提高农民的绝对收入，但不能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甚至会加剧相对贫困，不完全符合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

目前学界对中国城乡差距成因的认识基本一致，但是在解决乡村发展的对策上存在差异。经济学家李实倾向于外生性发展路径，即打破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促进城乡要素之间实现自由流动与公平交换，城乡间的发展差距将通过市场自由竞争的力量而逐步缩小”。^[9]与此相对，叶兴庆等学者则强调要立足于农村，通过加强产业的包容性、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等措施，加大惠农政策力度，从而解决农村发展的问题，^[10]整体而言，这种观点倾向于内生性发展路径。贺雪峰批判性地讨论了前两种农村发展思路，认为城乡差距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农村经济较好地区的农户进城，才能向更为弱勢的农村人口让渡盈利机会，从而增加农村收入的可能。^[11]

基于对上述乡村发展理论的梳理，本文以贵州省黔县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过程为例，探讨新时期乡村产业兴旺的发展路径。以黔县作为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第一，脱贫攻坚战期间，贵州省农村收入水平和整体村庄建设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贵州省于2019年开始启动“十县百乡千村”乡村振兴示范工程，黔县作为“十百千”示范村较为密集的县域，是研究中西部地区乡村发展的理想试验场。第二，贵州省的产业兴旺之路面临多山的地理环境、多民族聚居的文化基础和薄弱的乡村经济基础等多重挑战，集中呈现了中西部农村产业兴旺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以黔县为案例的深入调研具有探讨贵州省产业兴旺发展路径的典型意义。

黔县位于贵州省东南，依据黔县县志，全县总人口约60万人，以侗族人口为主，是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县。研究选取黔县的

6 个村庄为具体案例，其中包括 1 个苗寨，1 个汉族社区和 4 个侗寨。苗侗村寨群山环绕、梯田层层、依山傍水，寨中民居依山势而建，层层错落。侗寨的鼓楼是最具有民族特色和灵魂所在的标志性建筑，是侗族聚众议事的文化活动中心，自由错落的侗寨民居多以鼓楼为中心修建。本地产业均以农业和服务业为主，例如 L 村主要发展有机水稻种植和种养结合，D 村主要发展康养旅居，J 村的目标则是将特色农业与红色文旅有机结合，打造田园乡村。¹

2020—2022 年，研究组在黔县开展了追踪式的质性田野调查，资料搜集方法包括深度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与档案研究。本文的县级访谈对象主要是乡村振兴及产业发展相关的政府部门，以了解县级的整体产业发展规划；乡镇和村庄的受访对象包括县乡政府驻村工作人员和村干部，以通盘了解村务工作，梳理产业发展历史。同时，研究组通过入户走访的方式与普通村民开展深入交流，共完成访谈 124 例，其中一期 25 例、二期 99 例，涉访村民近 200 人，以此考察、理解村民在实现产业兴旺过程中的亲身经验与真实感受。

三、“楔入”乡土的产业发展过程

(一) 基于乡村实际定义产业兴旺

黔县的相对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也缺乏矿产资源，无法像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一样吸引大规模的外部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注入，因此本地二三产业整体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务工机会少、报酬低，农村收入主要依靠青壮年家庭成员赴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外出务工。据统计，2021 年全县外出务工人口为 12.5 万人，约占县总劳动力人口的三分之一。2020 年，黔县外出务工收入在农村家庭总收入中平均占比约 80%。² 调研发现，黔县乡村产业发展与村庄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实际发展水平紧密相连。越是交通不便、发展落后的村庄，外出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越高。例如交通最为不便的 G 村，家庭收入几乎完全依靠外出务工，没有青壮年外出务工的家庭生计极为脆弱。由于务工地生活成本太高、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与家乡差距较大，举家外出和在务工地买房的情况较少，大部分家庭有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村庄。

朱启臻指出，乡村振兴话语体系下的产业兴旺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外出打工挣钱再多也不能称其为乡村产业兴旺”。^[12] 但笔者认为，除了反映产业兴旺的内涵外，定义产业兴旺还要强调“基于村庄实际”。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土地制度、污染防治和绿色转型等条件的约束，在中西部农村复制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产业化经验是不切实际的。中西部农村在短期内无法提供能够替代青壮劳动力在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因此，这一区域的产业兴旺的目标应该从实际出发：“兴旺”不代表中西部农村能达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工业化水平，也不代表中西部农村能够在短期内培育出完善的二三产业，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务工。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产业兴旺是相对的兴旺，目标是基于原有的农业基础，发展培育适于常住农村劳动力从事的农业延伸性和经营性产业，能够为农村家庭创造稳定的基本收入，作为家庭工资性收入的稳定补充，从而让农村家庭收入多样化，减少收入脆弱性，提高抗风险能力，兼顾人们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和对乡村整体进步的需求。只依据发展理论，强调依靠村庄自身力量的内生性发展，强行切割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特征的外生性发展，这样的产业兴旺进路是不符合中西部农村发展实际的。

(二) 内生性发展与外生性发展互为补充的产业发展过程

近年来，国家与地方政府对农村发展持续性的支持政策吸引了黔县的一些“能人”返乡，创办了种植、养殖、旅游等合作社和企业，将本地的农村劳动力引入非农产业领域。表 1 是黔县 6 个村庄的相对地理区位的交通便捷程度、经济相对排位、劳动力组成和产业发展类型，便于理解基于村庄实际的产业兴旺是如何实现的。

表 1 黔县六村的地理经济情况与产业发展类型

村庄	交通便捷程	经济相对排	劳动力组成	产业发展类型	产业发展程
----	-------	-------	-------	--------	-------

	度 (方便—偏远, 1—6)	位 (发达—落后, 1—6)			度 (发达—欠发达, 1—6)
L	2	3	种植/养殖专业户、客栈/民宿运营人员、留守妇女、留守老人	生态稻米、稻花鱼、侗族特色文化旅游	2
S	4	4	留守妇女、留守老人	烤烟、水果、侗族特色文化旅游	3
G	6	6	农忙时回乡的青壮劳动力、留守妇女、留守老人	中药材、油茶、苗族特色文化旅游	5
D	5	5	留守妇女、留守老人	油茶、康养旅居	6
B	3	2	建筑技术人员、街道工作人员、农家乐运营人员、留守妇女、留守老人	油茶、生态旅游、红色旅游	4
J	1	1	村内能人、中青年周边工业企业务工人员、在县内就职的相关人员、留守妇女、留守老人	茶叶、油茶、腌鱼、侗果、红色旅游、民族特色旅游	1

林地耕地宽裕的村庄基于土地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以靠近国道省道的J村为例，村中能人牵头创办了茶叶、油茶合作社，把产品粗加工工厂办在村口，并与浙江茶商建立了联系，部分解决了粗加工后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此举拉长了原有农业种植业的产业链条，为本地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然而，当前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发展已经十分完善，茶叶产量常年过剩，粗加工后的农产品市场价格仍然不高，农民获得的利润很低，J村的茶叶、油茶种植业仍然依靠黔县政府的涉农补贴。尽管J村交通便捷，利于产业发展，但是J村的茶产品与同类产品没有区分度，缺乏市场竞争力，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稳定的资金技术投入，茶叶、油茶的产业链条虽有延伸，但是延伸不充分，没有显著提升产品价值的精加工。除了茶叶和油茶，J村传统的侗家腌鱼也在黔县远近闻名，村委会建立了稻田鱼合作社，带领村民在田间放养生态稻花鱼，并动员农户以传统方法制作腌鱼，统一销售，使得当地腌鱼产业实现了从产地到餐桌的完整链条。但是由于腌鱼风味独特，仅在黔县周边畅销，很难推广到其他地区，再加上每家每户的制作工艺和口味也不能统一，无法作为统一的品牌推向市场。2019年，B村所在的水系流域建成国家级湿地公园，B村也因此被划入生态安全保护区，土地使用受到严格限制。B村的产业发展围绕湿地公园打造，主推生态旅游。G村于2018年发动村民建立了灵芝合作社，尝试利用山间碎片土地发展中药材种植。然而，在投放灵芝技术两年后，村民发现当地气候条件并不十分适合灵芝萌发，产量无法达到预期，出产的灵芝品质也差强人意，进入市场后反响寥寥。

以上黔县各村的发展实践表明，产业兴旺绝不仅是在乡村“设置”产业，资金、技术、信息、文化、土地、人才、市场流通等多要素的配置，共同塑造了产业发展状况。舒尔茨指出，农村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农村人口质量低”和农村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供给不足。^[6]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界对“农村人口质量低”展开了充分的话语批判，^{[13][14]}但是农村发展要素供给与配置不足仍是当代中国中西部农村发展的重要掣肘。黔县各村的产业发展困境不尽相同，但可以归结为缺乏生产要素流向农村产业的宏观条件，如有需求的市场、更加自由的土地流转制度、现代化的农村产业生产方式等，因此缺乏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要素供给和要素之间的组合。实践证明，内生性的产业兴旺路径尚无法独立支撑农村家庭收入。

整体而言，黔县的农村家庭收入主要依赖市场驱动下的劳动力异地转移，当前黔县致力打造的乡村产业应以为农村家庭创造稳定、多样的收入来源补充为目标和愿景。乡村产业的兴起在政策扶助的同时也依靠着农民自身的力量与能动性，在产业发

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产业链条能够打破当地单一的就业结构，细化农村内部的劳动分工，在探索市场需求的过程中，进一步促进了本地农业种植业发展，留守村庄的劳动力被重新拉回到土地上，以劳动代替资本逐步形成基于农业的延伸产业，配合进城务工的家庭工资性收入，多渠道促进农民家庭增收。依赖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外生性发展和强调基于乡村的内生性发展，二者都会影响其他农村发展的要素发生变化，例如资源配置、信息交换、知识储备、经验积累、技术发展、村庄凝聚力等等。内生性发展与外生性发展的配合以及这些要素的交互，长期来看会形成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的正向循环机制。

(三) 承载乡村价值的乡村文化发展

产业兴旺不仅包括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的产业发展，还包括村庄文化资产的传承与弘扬。由于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相对闭塞，黔县农村地区仍然保留着较为传统的民居、民风、习俗、文化和历史遗迹，本地的文化资产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村寨建筑。

黔县大部分侗寨苗寨建筑极具民族特色，侗寨的鼓楼与花桥、鼓楼下的乡村文化仪式以及围绕鼓楼层层错落的村落格局有着较高文旅观光价值，汉族村落 B 村则是依河而建，湿地景观与村落古建融为一体，自然风光秀丽。

2. 历史文化。

黔县的汉族村落、侗寨苗寨保留了许多民族节庆习俗、民间手工艺术、地方美食。此外，J 村将红军领袖长征途中的居所、B 村将红军长征渡过的桥、走过的路以红色旅游路线的形式推出，在打造红色旅游产业的同时巩固本地的乡风文明建设。

3. 传统技能。

D 村基于本民族的古法农耕、传统养牛，开发了一系列旅游体验项目。G 村保留着苗寨牯牛饲养的生计传统与牯藏节文化，S 村是侗族摔跤的发源地，B 村、L 村在实践生态农业产业的同时，尝试老种子的育种、保留与试种。

依托村庄文化资产发展的产业为村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这些产业也促成了乡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社区营造和村民参与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立与发展。例如 S 村有“青年会”的传统，虽然大多数青年在外务工、求学，但近年来在村委会的号召下，年轻人每逢节庆都会回乡，成为民族文化特色庆典活动的主力军。在乡村振兴和产业兴旺政策支持下，S 村的年轻人通力合作，出资出力改善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路桥与老建筑修缮、公共照明翻新等，还通过远程电脑教室的方式向村民普及信息技术，并与留守的村民线上协作，对本地文旅线上宣传平台进行更新与维护。如 S 村青年小吴所言，“‘青年会’让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团结，一群人在一起做事，力量总是大一些。”由此可见，产业兴旺促动的乡村价值体系建立并不囿于产业本身，而是强调跨越狭义的产业，力图让本地所有的有形无形资产都形成回归本地的价值，并与地区产业紧密关联。

四、讨论与结论

黔县六村的案例分析首先引发了本文对“产业兴旺”的讨论：乡村产业兴旺是什么？如何定义与衡量？既有研究多强调基于经济和市场价值的乡村“产业”，也有部分发展社会学学者提出，乡村“产业”也包括乡村的全面发展。基于已有的学术讨论，本文认为，定义产业兴旺一定要基于乡村实际——实际不仅指既有的资源禀赋，更是当前的发展水平及发展局限。以黔县为例的中西部农村不可能实现与东部沿海农村地区一致的“产业兴旺”，因此“兴旺”是一个相对概念，这意味着衡量乡村产业兴旺的实现程度不能简单以经济数字为指标，更不能用共同富裕蓝图下的美好生活做摹本。产业兴旺一定是基于实际的整体进步。“兴旺是相对的兴旺”，只有以尊重为前提实际，才能讨论乡村产业兴旺的发展路径。

基于黔县的案例研究，结合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理论中的外生性和内生性发展模型，本文进一步讨论和比较了乡村产业兴旺的两条发展路径，梳理总结如下：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产业发展道路。与“十三五”及之前的发展策略相比，新时期的乡村产业兴旺不再以提高全国整体工业化水平为目标，而是旨在兴乡富民。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乡村产业“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利益联结紧密，是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产业。”产业兴旺是以农民为利益主体，发展的利益不输出，而是保留在本地。这也引发了本文对“发展主体”的思考：乡村产业兴旺为了谁？依靠谁？谁说了算？谁来干？怎么干？黔县的发展经验表明，新时期我国的乡村产业仍然植根于农村和农业，其主体执行者是农民，农村、农业和农民是乡村产业产生和发展的根基。黔县六村正是在此基础上培育了具有本村特色的工业或服务业，只有扎根于本土的产业，才有可能兴旺。实证经验表明，受制于地理区位条件、经济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各村的产业发展都尚未达到以经济指标定义的绝对的“兴旺”，但基于乡村本土、依靠当地人的乡村内生性发展路径，尊重了常住乡村人口的发展需求、培育了当地的发展能力、尊重了文化技能的多元和独立性，因此内生性发展仍然是产业兴旺的根基。

其次以黔县诸村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收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要依靠剩余劳动力转移，即外出务工来支撑。“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下，许多学者和地方政府提出“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口号，但是本文要强调两点：1. 劳动力转移是基于劳动效益和劳动报酬的市场配置的结果，也是农民的自主选择，随着乡村产业发展，基于乡村本地的劳动绝对生产率和边际效益会提升，本地务工与外出务工的比较效益逐渐趋于平衡，劳动力自然会回流本地；2.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仍然拥有强大的宏观管理和调控能力，即伴随着农民工的流动，其他要素的配置未必按照市场规律转移。例如政策对城市资本下乡的管控和农村土地使用的严格城乡隔离。这些政策表面上看是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实际上却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筑起了一道牢靠安全的防护城墙。如果城市资本能够自由进入黔县农村地区，甚至投资控制农村土地，那么当地的茶产品加工、康养、有机种植等，会获得更大的市场竞争力，但同时也可以预期资本掌握话语权，当地的农民必然会失去对这些产业的实际控制。到那时，绝对意义上的产业兴旺也许能快速实现，但发展的红利并没有落到本地人头上。因此，本文认为，现阶段中西部农村家庭收入仍然要以基于劳动力异地转移的外生性发展为主，并且在强大政府宏观管控的条件下，外生性发展不仅是对农民主体性的尊重，而且有利于迅速弥合城乡收入差距，让发展的红利最终多渠道归聚于本地人。

综上所述，我国新时期的乡村产业兴旺不再以乡村剩余廉价劳动力作为发展优势，也不仅仅狭义聚焦于乡村本地的产业发展。在中国经济倚重城市工业化发展的40多年后重新思考如何发展乡村产业，首先要承认乡村产业无法脱离城市资源、技术和信息的支撑而“兴旺”，乡村产业兴旺的本质是进一步完善城乡分配格局，让城乡分立的二元产业发展模式向更加协调的现代产业发展模式转变，为农民提供更多实在有效的创业方向和就业机会，逐步形成以城带乡、外生内生相互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城乡两端、市场与政策要共同发力，想方设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承认和尊重人的劳动、普及公共服务、让身处城乡的农村劳动力都能发挥价值，将乡村发展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紧密连接起来，让本地人重新回归到主导自身发展的位置上去。因此乡村产业兴旺的外生性发展模式和内生型发展模式在本质上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具有各自的核心价值，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情境下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协调融合形成农村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 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19-04-29)[2022-08-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2] 张延升. 农业内源性与发展方式的比较分析[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6):22-25.

[3] 张环宙, 黄超超, 周永广. 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2):61-68.

-
- [4] Lewis A W.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M]. Routledge, 2013.
- [5] Nerfin M. Another development: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M]. Uppsala: Dag Hammarskjöld Foundation. 1977.
- [6] Schultz T W.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4): 639-651.
- [7] 辜胜阻. 统筹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改进低价工业化和半城镇化模式[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5): 2-4+95.
- [8] 叶兴庆. 以提高乡村振兴的包容性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2): 2-14.
- [9] 李实, 陈基平, 滕阳川. 共同富裕路上的乡村振兴: 问题、挑战与建议[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 37-46.
- [10] 叶兴庆, 等.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载马建堂主编. 奋力迈上共同富裕之路[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2: 62-77.
- [11] 贺雪峰. 如何理解现阶段中国城乡差距——兼与叶兴庆, 李实商榷[J]. 社会科学, 2022(6): 137-145.
- [12] 朱启臻.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产业——产业兴旺的一种社会学解释[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89-95.
- [13] 杰华. 都市里的农家女: 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33-40.
- [14] 吴小英. 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2): 163-176+207-208.

注释:

根据学术伦理要求, 本文中的黔县及相关地名、人名均为化名。

(1) 资料来自作者对黔县的田野调查。

(2) 本部分数据均由黔县产业发展相关部门提供。